

张荣华编

薪火相传

——记费孝通教授

群言出版社

X
I
N
H
U
O
X
I
A
N
G
C
H
U
A
N

张 荣 华 编

薪 火 相 传

—— 记 费 孝 通 教 授

群
言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薪火相传/张荣华编.-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9

ISBN 7-80080-262-0

I. 薪…

Ⅱ. 张…

Ⅲ. 费孝通-纪念文集

N. 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7186 号

群言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

北京市先锋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2插页 200千字

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

G·156 定价:15.00元

编者的话

1996年为庆祝费孝通教授从事学术研究60年,我们编辑了《犁过的土地》一书,记录了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人类学、社会学家的费孝通教授实地考察过的部分地方和企业的同志所撰写的纪实性的文字。该书出版后受到大家好评,给了我们很大鼓舞。

费孝通教授除了在学术园地里辛勤耕耘外,自1938年任云南燕京社会学研究室主任,社会学教授以来,一生从未离开过教师岗位。时至今日,他已年届九旬,仍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依然在指导博士生的学习。他说,他最喜欢的职务就是“教师”。

今年是费孝通教授九十华诞,我们约请了他的十几位学生写下了这些文字,作为向老师祝寿的贺礼。

此外,我们还将其他同志所写的记述与费孝通教授一同工作和学习的有关文章,也一并收在书里,借以表达我们共同的心愿——祝费孝通教授健康长寿,永葆青春!

张荣华

1999年8月

目 录

师从费老 探索社会 品味人生	罗涵先	1
费孝通同志与新时期民盟工作	吴修平	21
我心目中的费孝通	于孟达	51
为研究中华民族形成创立了核心理论	陈连开	60
潇洒无尘 耿介绝俗		
崎岖历尽 书生面目	王 尧	72
善于利用时间的人	张祖道	81
良师益友——费孝通教授	刘豪兴	88
转变农民消费观念 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赵龙跃	100
治学、为人的楷模	何炳济	115
费孝通与历史文化名城金华	方竞成	126
不倦传道的人生	季 进	133
文学圈外 文章高手	李国涛	138
费孝通与《光明日报》	夏 欣	143
我们的费先生	张 彦	152
做对人民有用的学问	王延中	167
读《反思·对话·文化自觉》的体会	丁元竹	179
我的老师费孝通	徐 平	189
费孝通——一生梦寐以求的理想	蒋 晔	200
情系残疾人高等教育事业	任志新	210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张 宁	210
费老与乡镇企业	柴宝亭	215
	杜兴华	220

少壮东南走 老马西北行	苑巧云	229
情系贫困县	兴林 宪增 玉堂 书允	233
一部研究乡镇企业发展道路的力作	时 茜	235
坎坷生涯平凡人 真诚心怀天下事	费宗惠 张荣华	239
老当益壮不坠青云之志	李国强	249
志在富民的费老	潘秀玲	260

师从费老

探索社会 品味人生

——祝贺费老九十华诞而作

罗涵先

我和费老早就相识,但比较熟悉则是在 50 年代以后,那时他任教民族学院,学习却在民盟。我也在民盟学习,工作则在农业出版社。当时的学习宗旨是世界观的改造,所读内容十分广泛,从国际到国内,从天下大事到身边琐事,无所不论,无所不谈,俯拾即是,无需命题。学习会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但微言大义,细雨和风,令人叫绝的是潘老(光旦)在帮助一位我们十分亲密的朋友剖析思想时,只用了“车水马龙”、“冠盖往来”八个字,大家心领神会,认为入木三分,十分贴切,亲切之情,跃然眼前。在这样的氛围里,朝夕相处,彼此之间的接触就不能不深入到内心世界。由于我们是在经历过这样的“心旅”之后,才开始共同的学术活动的,所以底蕴充足。

我和费老在社会学领域里的探索,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跟随、师从的过程,他在年龄上长我一轮,而在学海中则长我一辈。1987 年,我写的一本《中国农村发展社会学》在香港出版,他为我作序,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本书的著作者和我有四十多年的交情。我们在解放前,抗日战争时期,同在西南大后方从事民主运动。我们是一个政治团体——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我们很早就对中国农民在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中的重要性有一致的

认识，所以都以中国的农民和农村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而且我们对中国农民问题也有许多相同的看法。这些是我们两人相同的一面。但是我们也有不同之处，他是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底子来研究农村经济的学者，而我则是学习社会学或称作社会人类学出身的。这个差别，使我们在所熟悉的研究方法上也有所不同。简单地说来，他是惯于从宏观出发去观察中国农村的变化，而我则喜欢对具体的标本进行微观的解剖。如果我们各自在自己学科的范围活动，正不妨各从所好，各行其是。但是如果关心到中国农村的实际改造和发展，那就得对它有个更全面和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双方的配合协作也就非常有必要了。”正是这样，我们从各自领域出发，进行共同的努力与探索，使我们的工作兴趣盎然，使我们的合作，亲密无间。我尤其记得，那回在苏南调查中，同坐一辆小车奔波于苏州、无锡、常州、南通之间，一路交谈，忘却疲倦，使我得益良多。我虽无缘在课堂上受到费老的熏陶，但在共同的社会调查中却亲聆了他的教诲，学海无涯，沐浴其中，深有“其乐融融”之感。我从来没有在和其他学者的合作中感受到如此浓厚的情谊和愉快。

苏南调查是在1983年冬季举行的，参加调查的除费老和我外，还有钱伟长同志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苏省社科院的部分同志，调查组的名义是全国政协小城镇调查组。那时他兼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我则是专职的副秘书长。根据费老的思想，中国农村要想富裕起来，必须在农业以外，开展一些非农产业。他从青年时代就开始进行这一工作，他当时“蹲点”的所在，是他自己的家乡吴江县开弦弓村，开弦弓村是以蚕丝著名的，他的姊姊费达生是一位蚕丝专家，她曾以很大的精力帮助本村农家种桑养蚕，为了抵制蚕商的剥削，又帮助农民在村里办起了小型缫丝厂，这一带出产的“十里湖丝”的名声享誉海外。他的调查报告后来成为他在英国大学的毕业论文，并得到他的导师、著名社会学家马林

诺斯基的赞许,论文出版成书,命名《江村经济》,成为他的成名作。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调查开始了他的“从一个点观察农村经济发展”的事业,苏南调查对费老来说,是他以毕生精力所从事的社会调查的发展和继续。我们每天在“走马看花”之余则在餐桌上进行交流,并商量下一个目标的探索。在这次调查中,我们特别注意到几个引人入胜的题目:其一是农村人口向小城镇的聚集;其二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其三是农民增收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农村人口向小城镇的聚集是不可避免的,农村工业的举办要求小城镇为他们提供从电力、交通、商贸到信息的服务。发展小城镇以吸引农村居民比农民向大城市转移要有利得多。农村工业搬迁到小城镇上来,还可收到“聚集效应”。小城镇的建设需要规划,更需要投入,但方向是正确的。费老所写的《小城镇 大问题》这篇文章中的观点在这次调查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正在这时,传来了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对费老这篇文章所作的批示,我们大家都受到了很大的鼓舞,费老本人更是十分感动和兴奋。后来,文章连同耀邦的批示,在《瞭望》杂志上全文发表了。

在调查组作总结的时候,费老要求参加调查组的主要成员每人作一个总结发言并各写一篇文章,我的总结发言是讨论人口的产业转移,我的结论是发展乡镇工业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是一条消化剩余劳力的可行的道路。由于乡镇工业利润较高,在向国家交纳税金,向社区交公积金、公益金和支付工人货币工资之外还可以“以工补农”,形成“四马分肥”。后来,我以这个发言为基础写了一篇题为《从苏南农村调查看乡镇工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文,受到中共江苏省委的重视。在这篇论文中写有如下的一段话:“乡镇工业问题和围绕乡镇工业所出现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是从经济问题中分泌出来的社会问题。其中最引人

注目的就是农民工。农民工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亦工亦农人员，他们在经济上的特点是从农业这个部门转移到工业这个部门，每个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大大提高了，在社会财富大量增加的同时，从事农民工的农村社员在劳动报酬上也有所提高。从社会学的观点看，农民工使社会增加了一个既不同于工人，又不同于农民的劳动阶层。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在工业部门中虽然属于较低的类型，但比起农业来，却又高了许多。目前全国农民工的人数已达百余万人，可称为百万大军（实际数字可能要比这更多）。把他们逐步安置到农村集镇上，给以适当安排，是一项极其繁重的工作。它必然要引起商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服务业等行业的相应发展和集镇建设的一系列变化。可以预期，农村集镇必将随着城乡经济的发展而逐渐繁荣，成为名副其实的城乡结合的纽带。”这段话反映了费老和我的共同认识，费老在这个观点的形成上，起了主导的作用。接着，作为全文的结论，我写了如下的一段话：“苏、锡、常、通四市所属农村，如前所述，代表着一种类型，它与城市的关系以及以这种关系为基础所形成的结构，提供了一种模式。我们认为它决不是惟一的模式而只是多种模式中的一种。我们需要继续努力，去发现适合于其他各种特定环境的形式。”这段话受到费老的特别称赞，费老还把此行所得归纳成四个字，即“苏南模式”。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苏南模式的由来。

在苏南调查的过程中，我们时时关注着农民生活状况的变化。在这一方面，我也从费老那里学习到很多。一路上，他十分注意观察农民的住宅，农民住宅的变化是最能反映农民生活变化的。我们走了一路，看了一路农民的住宅，其规律是从草房到瓦房，从平房到楼房。但我们一路已经看不到多少草房和平房了，几乎全都变成二层楼的“小洋房”，个别还有三层楼的。更个别的则是“别墅”，那是在南通市海门县汤家乡的中兴村看到的。它座落在一个环湖构造中，其豪华的程度超过我们的想像，不仅

豪华,而且装修陈设不俗,这反映了别墅主人的文化品位。中兴村的经济状况和运行方式非常特殊,以致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在这个村子里,大约有93%的劳力在从事乡镇工业的生产,只有7%的劳力务农。这93%的劳力并不是全部在乡镇工厂劳动,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车间就在家庭内部。这种由工厂组装,零部件分散在家庭内加工的劳动管理方法,是适合于该地工业生产水平的一项革命性创新。它最重要的特点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具有哲学意味的是,这种“家庭车间”把人们的生产、生活、天伦、情操、艺术享受全揉合到一起了。我们曾在那里亲见妇女们在自己家内小车床前劳动的情景,从隔壁房间无线电收音机里传来的悠扬的乐声,孩子们正安静地做着功课,老太太正在摘菜,等待媳妇休息时去烹调。这是车间,也是家庭;这是生产,也是生活;这是劳动,也是伦常。它们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形成一幅令人神往的画面。

中兴村的变化是从1979年开始的。在1978年以前,这里还只有农业,社员生产生活水平都很低。1979年以后,它开始从地面起飞,1982年农副工总收入竟比1978年增长了4.2倍,翻了两番还要多。变化从何而起呢?主要是结构。1978年以前,农业在农工副三业的总产值中占50%左右,工、副业各占1/4。从1978年起,工业产值上升到80%,继而增长到90%以上,农业的比重则下降到5%以下。由于工业比重的增长,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与此同时,大队的固定资产也有了较大的增长,现在全大队已有四个工厂,五条出海渔船,固定资产总值近400万元,年人均收入近5000元。农民家里拥有彩电、录音机等已不稀奇,当我们第一次在一户农家看到空调设备时,真不禁赞叹不已。他们是怎样走过这条道路的呢?综合起来有三条:第一条是发展副业积累了原始资金,主要是捕鱼和养禽。捕捞,是得地利之便,滨江近海,交通便利,年产海产品达千担以

上。捕捞得来的大鱼上市场出售，小鱼小虾则用以养鸡养鸭，通过捕养并举，壮大了经济力量。第二条是从食品罐头开始，办起了工业，不仅进一步壮大了资金力量，而且锻炼了工业管理能力。第三条是开发智力资源，下本钱聘请外来技术人员，培训青年技术人才，在这基础上办起了金属压延厂，进而进行多次加工增值。生产电器，农业机械等产品，过了质量关，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在这个发展基础上，他们大胆实行了外发家庭加工的办法，凡是适宜分散到户加工的产品，一律分散到户。其设备、工具由工厂协助，家庭自备；材料由工厂统一供给；对技术实行统一指导，对产品实行统一组装，成品则由工厂统一销售，工厂对家庭发给加工费。据了解，小车床大约只需五六百元，大的也只有千元左右。每个家庭根据劳力情况，可以自备1~2台车床。社员资金力量完全可以胜任。这个办法好处很多。从工厂方面说，用不着多盖厂房，用不着监督生产的人员，用不着统一的照明、卫生、通风设备，用不着过问零部件的生产细节。从家庭来说，可以调剂劳力，调剂劳动时间，还可以调节生活节奏，减少工业劳役之苦。实行以来，不仅减少管理上的烦务，而且大受社员家庭的欢迎。

他们还实行了另一项重要的改革，就是允许社员投资，凡投股的社员，均可按股分得股息和红利，这样，既聚了财，集中了农民的闲散资金用于生产，又形成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结合，结成新的物质关系，有利于全体劳动者更加热爱集体事业，更加关心企业的管理和技术革新，更加关心企业的经营成果。

除了海门县的中兴村以外，在其它乡村，也有类似的劳动组织形式。不过在那些地方，委托家庭加工的不是机械产品，而是服装、针织、编结、酿造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条以销售农民家庭加工产品为特征的农民街。街上家家户户，前店后厂，规模

大的则另外办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都是拿来销售的。所有这些都，都是外发家庭加工制的应用，只是由于这些产品的加工，不需车床和车间，因而不那么引人注目罢了。

农村经济在不断地变化，推陈出新，层出不穷，新事物正在不断涌现。人们的实践和创造是无限丰富和多彩多姿的，专业村的出现，则又是一件新事。

专业村也出在海门县，它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资源的特点，技术的传播和开拓户的实践起了重要的作用。现在看来，从专业户发展到专业村，有许多好处，它便于统一组织产品运输和销售，便于统一进行技术的引进和提高，便于统一组织工艺的分工与协作。

专业村出现以后，家庭车间就更普遍了。家家机杼声，户户灯火明，这是农村工业化的美的图画，也是农村城市化的优美乐章。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人们有理由相信，还会有更多、更富于创造性和生命力的事物将要出现在前头。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产业转移的不同模式不断出现，这就发生如何准确表述苏南模式的问题，费老和我都曾以不同的语言对此发表了看法，我们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大体说来，苏南模式的基本点是：

一、它是工农并举以工为主的模式。80年代以前，整个江苏省的农业是搞得不错的，但很畸形，苏南农村普遍实行双三制，有的地方一年两熟，有的地方一年三熟，实行这种强化开发的原因是出于全省人口对于粮食的需要。那时，苏北的粮食产量很低，亩产只有200~300斤左右，8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变化，广大苏北地区从70年代中期开始的“旱改水”到80年代得到普及，粮食亩产达到千斤以上，翻了两番还多一些，江苏省的粮食生产重点从苏南转移到苏北。与此同时，苏南的乡镇工业有了迅猛发展，农村大部分劳力卷入了工业，以致出现劳力不足的现

象，“雇工”由此产生，这里的雇工是个借用的名词，它和资本制下的雇工有根本的差别，这里所说“雇工”实际上是反映了农业劳力在不同农村间的地区流动，由于流入劳力和苏南农民都有不同程度的“沾乡带故”的关系，因而这种流动往往是“不惹眼”的，但就在这种“不惹眼”的变化中，苏南农村的产业主体改变了，无论是在产值的比重上、在主要劳力的分布上，工业都被突出了，农业反而成为次要的产业。二、苏南模式的另一特征是它的社区性，为了说明的方便，我们不妨从前面所提到的“雇工”现象说起。本来，按集体所有制的概念来说，应该是同一集体内的劳动者享有同样的权利，但苏南的“雇工”不但在民主管理上待遇不同，而且在劳动报酬上也是苦甜不均。外来劳力参加苏南农村的劳动一部分在农业上，一部分在工业上，在工业中的外来劳力不但不能“同工同酬”，甚至工作内容也有差别，往往外地劳力主要是干那些脏活、累活和本地劳力不爱干的活路。此外，在人们的心理上也是如此，本乡本村的劳动者都把企业看成是自己的企业，而外来劳力在心理上自居“客位”，其原因何在？原因就在“社区所有制”这个根本问题上。它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产物。

社区，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是区域的意思。乡镇企业由于在我国经历了“合作社——公社——三级所有”的发展过程，已经形成了社区生产关系，而和80年代以后新出现的“联合”大不相同。80年代以后新出现的联合，是以人为基础的联合，而不是以地为基础的联合，许多联合体，不仅不受本乡本村的地域限制，甚至可以打破县界、省界。而50年代以来的“合作社——公社——三级所有”却不是以固定的社员为基础，而是以一定社区内的劳动者为基础，最初把他们联在一起的是土地。而在乡镇企业中，则是原始资金和一定的固定资产维系着他们。直到现在，人们还在议论乡镇企业的“官办”问题，其实并非“官办”而是社

区在办,有的由一定社区内的经济组织管理,有的由该社区的党政部门代管,不管是谁管理,其利润除用以扩大再生产外,都要以一定份额去支援该社区范围内的农业发展和其它社会福利事业。人们把乡镇工业利润用于支农的情形称为“以工补农”,这已形成一种稳定的做法,并成为政府政策。“以工补农”之所以行得通,其理论基础就在社区所有制。苏南的乡镇企业利润若被用作补助皖北的农业,苏南农民能接受吗?那是不会被接受的,但以苏南乡镇工业利润之一部分来补助苏南的农业,则苏南农民不仅同意,而且认为那是当然的事情。此外还有一点:在社区范围内的劳动者,不管他们是何年出生,都是该社区所有制企业的主人,他们只要成年,就成为该社区内的当然的劳动者,有承包土地或获得其它工作的权利,而不需要经过任何手续来肯定他的身份。他的出生地和居住地本身就是一切手续,一切证明,一切承认。实际上不仅乡镇企业属于社区所有制范畴,而且集体所有的土地,也是属于社区所有制的范畴,我国宪法上所规定的农村土地属于劳动者集体所有,只是一个大原则,在具体实践上却是归一定社区范围内的劳动者集体所有。在我国农村,几乎大部分的农、林、牧、集体企业,在所有制的问题上都无不打上社区的烙印。

“以工补农”机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中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其特点是国家财政资金还相对缺乏,不仅无力进行较大规划的农业投资,而且在价格上还不能根本摆脱剪刀差的威胁,因而使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都受到一定的制约。乡镇工业出现以后,农民通过实践认识到工业利润高于农业,提高了务工的积极性,许多农村劳力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被称为“农民工”。他们总结经验,概括成两句最通俗而又最生动的语言,即“无工不富”和“无农不稳”,随着农村工业的发展,国家在农民实验的基础上,正式承认以工补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一项长期政策。

以工补农政策的实施是与大量农民工的出现分不开的。农民工的特点是虽然在劳动方式上已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但仍然居住在农村，并且以自给粮食作为口粮，人们把他们称为离土不离乡的农民。近年来，许多地方实施了自带口粮入城落户的政策，促使地方农民工更多地靠近了城市，但由于他们的口粮仍然依赖于自己或自己家庭所承包的土地，因而他们仍然是“农民工”，和城市的工人有很大差别。从社会学的观点看，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

苏南调查结束前，费老就提出了“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设想，这是由于苏北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状况，特别是经济发展程度都和苏南有很大的不同。次年春天，这个设想实现了。我仍然作为基本的班子参加了调查，这次调查行程较短，只去了镇江、扬州两个市。两市情况虽不完全相同，但有些类似。若和苏南各市比较起来，就差别较大了。顺便提一下，我们在以后的调查中，由于有了苏南调查的底子，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往往要和苏南的状况相比较，通过比较看出特点。这也是我们从费老那里学来的一“招”。通过对比，我们感觉到，镇、扬两地农村有以下几个与苏、锡、常、通四市不同之处。第一，苏、锡、常、通四市的农村有上海、无锡等大中城市的“工业辐射”，农村工业不仅可以委托加工、零部件承做等方式得到城市经济的荫护，而且还可以通过“脱壳”、租让、承包等方式直接得到城市经济的帮助。而镇、扬两地则缺少这个条件，镇、扬虽也有一些乡镇工业，但由于缺乏营养，发育不壮。第二，苏南有工业城市退休工人的技术支持，而这里却缺少这个条件，这也是发展不起来的重要原因。第三，苏南农业积累比较深厚，起步资金容易筹集，镇、扬的状况远远不及四市。但我们却在镇、扬两地发现了另一些特征，那就是干部的年轻化和知识化。当我们和两市的干部坐在一起研究问题时，感

觉到的印象是他们能以现代科技为基础来构想未来。农村经济方面没有看到特出之处，但我们很快就发现镇、扬两地在经济上虽不如苏、锡、常、通四市那样发达，但比较持平，不能算是贫困，不能代表苏北，因此，费老当时就决定，一定要抽时间到淮阴作次专访。我是淮阴人，对此当然十分赞同。但由于当时要赶回北京开会，这个心愿就遗留下了。几个月后，心愿得到满足。这是我第三次跟随费老出去搞调查。

淮阴在江苏省是一个比较贫困的地方，由于我对淮阴有特殊的感情，所以对于淮阴怎样脱贫这个问题是一直关心的。到了那里以后，才知道，原来淮阴市和整个苏北地区虽然比较落后，但已经不是我幼年时代的情形了。“少小离家老大还”，对于这里的变化，我不能不感到惊异。我出生于淮阴县的一个镇——王营镇，现在已成为城区，和清江市相连而成为市府所在地。淮阴和整个苏北地区，从70年代开始，就在经济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是在农业上实施“旱改水”工程，这是一个大战略，水把大片盐碱地上的掩盖物冲刷掉了，种上绿肥以后，土质有了改变，原先亩产只有100公斤的农田一跃而达500公斤以上，江苏省的粮食基地开始从苏南移向苏北。但苏北地区较之苏南仍然是滞后的，尽管在淮阴已经流行“苏北赛江南”这样一句话，从而鼓舞了苏北人民。苏北也有苏北的优势，最大的优势是人均耕地面积较之苏南要多两倍，加之平原绿化较好，水面较大，鱼类水产业发达，难怪它被淮阴人称作新的鱼米之乡了。80年代以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村经济政策的影响下，农业总产值增长了一倍，林牧副渔增长了一倍半，工业也有一定的增长。但由于投资少，全市产业结构还基本上属于农业型的。当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淮阴放在我们眼前时，不能不引起了我们大家的关注。费老一向注重“乡土经济”，十分重视在农业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富裕，这使他为找到一个恰当典型而兴奋。